



【经济研究】

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影响的述评与思考

江涛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陕西西安 710069)

摘要: 计划生育政策降低了生育率,推动了人口的迅速转型,产生了巨大的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然而,低生育率造成的人口结构问题,正对中国经济产生消极影响。在这种背景下,对计划生育政策提出的背景和具体内容进行简要回顾,并总结和分析人口结构问题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最后,为使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产生积极作用,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方向提出了相应建议。

关键词: 人口结构;生育权利流转;女性生产力回报

中图分类号: F06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731(2013)03-0130-04

一、提出计划生育政策的背景和发展经历

我国人口与经济关系运行得不协调,是我国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根本原因。在“大跃进”时期,人口与经济、资源和环境之间的矛盾已充分暴露。在1962年,为引导生育走向有计划状态,国家在城市与人口稠密的农村地区倡导节制生育。在“文革”时期,庞大的人口规模与停滞的经济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为缓解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国家于1971年在全国城乡范围内普遍推行计划生育,并在1973年提出“晚、稀、少”政策。随后,生育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迅速下降。改革开放后,为进一步对人口增长进行控制和提高人均GDP,国家在1980年将计划生育政策从“晚、稀、少”政策转变为“独生子女”政策及以后大部分省(区、市)农村的“一孩半”政策。整个计划生育政策方式和内容的演化,缓解了人口与经济、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反映了人口增长应该与生活资料、生产资料协调发展的关系。但与此同时,这也逐渐累积了人口结构问题。

二、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意义与经济影响

(一) 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意义

计划生育政策降低了生育率,使我国人口增长率得到有效控制^[1-4]。如从1995—2009年,我国人口出生率长期稳定处于低增长状态。这说明我国人口增长速度已经获得有效控制^[1]。在1972—2008年间,由于计划生育的作用,中国少生了4.58亿人^[2]。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低生育率使我国人口在短时间内迅速转型。这缓解了人口规模庞大、增速过快对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的压力。生育率下降,在微观上讲,有利于家庭提高孩子的养育质量,实现孩子质量对孩子数量的替代,进而提高整体人口素质;从宏观上讲,有利于提高社会储蓄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人口结构转变对我国人均GDP和人均储蓄率提高起了正面的推动作用。从具体文献看,比如胡鞍钢等表明,人口结构变迁(劳动年龄人口份额上升和人口抚养比下降)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到1/6—1/3^[5]。汪伟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可能是储蓄率和人均收入增长率上升的重要原

收稿日期:2013-01-15;修回日期:2013-03-23

作者简介:江涛,男,湖北鄂州人,西北大学博士生,从事婚姻推迟、出生性别比研究。

因^[6]。当然,有文献提出不同看法,车士义和郭琳认为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高估^[7]。此外,李文星的研究表明,在1989—2004年期间,中国儿童抚养系数的下降,提高了居民消费^[8]。从总体上看,生育率迅速下降造成的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起了正面的推动作用。

(二) 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如上所述,计划生育政策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但是,与此同时,它的负面效应在这几十年中也在不断累积,并呈日益扩大化趋势。“一孩”以及“一孩半”政策对生育数量的控制,使我国生育率长期保持较低水平,形成了我国少儿人口比例逐渐减少,社会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的问题。这也给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特别是农村家庭养老)提出了挑战——“两个孩子”至少要养活“四个老人”甚至更多,这将给孩子未来的生活造成很大负担。并且,在社会“男孩偏好”的影响下,生育率的控制,使社会出生性别比严重偏离正常波动范围。因而,计划生育政策严重影响了我国人口结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年龄结构的问题在于,社会老龄化趋势日益加重;而性别结构的问题在于,出生性别比长期居高不下。无论是社会老龄化还是性别比上升,均给我国经济带来了负面影响。

直接研究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影响的文献主要分析计划生育政策对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如汪伟指出暂时没有发现老龄化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但是,这可能是由于我国现在处于老龄化初期,老龄化对于储蓄率和人均收入增长的影响的方向和大小还有待观察。一旦未来老龄化的负担效应超过寿命效应,并占据主导地位,老龄化很可能对经济增长和储蓄率产生负面影响^[6]。周俊山和尹银通过面板数据分析,表明计划生育政策是居民储蓄率变化的重要原因。农村性别比失调,导致婚姻挤压,进而使家庭为儿子婚姻问题,储蓄比其他家庭更多的财富,最终导致竞争性储蓄。并且,这一结论与WEI等的研究结论一致。这种储蓄动机本身,并不利于经济增长。比如竞争性储蓄下的消费行为,很可能表现为结婚时期的“井喷”消费^[9-10]。

间接分析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影响的一类文献主要探讨了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储蓄、消费、劳动收入份额和经常账户余额等的影响。考察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和储蓄率关系的文献认为,老龄化不利于经济长期增长。其中,胡鞍钢等通过1995—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表明,老龄化将降低中国

储蓄率,并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产生负面冲击^[5]。马骁骁的研究表明,随着老年人口比例不断升高,劳动人口比例连续下降,老龄化将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11]。范叙春和朱保华认为,个体年龄阶段不同,其收入、消费与储蓄行为不同。该研究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显著影响国民储蓄率。在考虑时间效应的情况下,少年人口抚养比上升将提高国民储蓄率。而老年人口赡养比上升,将减少国民储蓄率。在不考虑时间效率的情况下,少年人口抚养比和老年人口赡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方向恰好相反^[12]。

还有部分讨论年龄结构对消费影响的文献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很有可能是消费下降的重要因素。李通屏和郭熙保考察了人口增长率与消费的关系,研究表明,人口增长率对消费率提高具有拉动作用^[13]。张乐和雷良海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导致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少儿抚养比下降和老年抚养比上升,导致居民消费率下降^[14]。李春琦和张杰平通过对1978—2007年中国宏观数据的研究表明,少儿抚养系数和老年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均有显著的负影响^[15]。还有其他研究显示,老龄化有利于提高消费。如王宇鹏对2001—2008年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进行实证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显著影响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在控制其他因素条件下,老年人口抚养比越高,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越高^[16]。

此外,也有部分文献研究了年龄结构与劳动收入份额和经常账户的关系。如魏下海等研究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将影响个体储蓄行为,进而影响生产的资本集约程度;在资本与劳动替代的情况下,资本集约程度降低劳动收入份额^[17]。汪伟的研究表明,人口结构变化是我国经常账户余额变动的重要原因,它可以解释近45%的账户余额变动^[18]。

另一类研究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影响的文献主要探讨性别结构失衡对经济的影响。虽然,计划生育政策不是促使性别比上升的根本原因,但是它间接与性别比上升相关。性别比上升,不仅造成了大量男性终生未婚人口和逐年攀升的男性未婚人口比例,而且其影响已经涉及经济领域。相关研究显示,性别比影响储蓄率^[9-10]。WEI等的竞争性储蓄假说指出,性别比上升,促使男孩家庭为儿子在婚姻市场处于有利地位,通过提高家庭储蓄而相互竞争,进而解释中国高储蓄率现象。此外,他们的研究还表明,在性别比更高的地方,地区房价也更高^[10]。李

树苗和胡莹表明,男女在储蓄、消费、投资等方面存在性别差异,在女性储蓄倾向高于男性的情况下,女性相对收入增长,使女性在家庭中的谈判力上升,从而有利于提高储蓄率。在性别结构失衡的地方,女性在婚姻市场有更高的谈判能力,而且在家庭消费和孩子投资方面,也享有较大的发言权^[19]。因此,性别比上升有利于提高储蓄率。而这并不利于我国消费的提高。据以上大多数文献的分析,无论是计划生育政策本身,还是该政策引致的人口结构变化,均对我国经济长期增长、储蓄和消费等存在不利影响。

从总体上看,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人口在短时期内迅速实现了从“高生育率、低死亡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转型。这有效地控制了我国的人口数量,使经济增长的成果没有被更多的人口“稀释”。然而,“低生育率”带来的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而且这给我国经济运行带来了日益增多的不利影响。

三、关于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建议

(一) 既有文献关于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建议

一般认为,“一孩”政策或“一孩半”政策无法应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难以解决未来更严重的社会老龄化问题、性别结构失衡问题和经济长期增长问题。因而,既有文献关于调整生育政策的建议基本集中在放宽生育数量方面^[1,6,9]。他们认为适当放宽生育限制,可以在短时间内缓解未来严重的社会老龄化问题。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在长期内,人们生育孩子的意愿数量将进一步下降。生育政策可以限制人们生育数量,但无法在生育意愿普遍下降的情况下,促使生育率上升。政府放宽生育数量限制,在短期内有效,但在长期中效果不确定(这是因为人们生育率呈下降趋势)。届时,通过放宽生育数量来解决人口结构问题则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而,为促进经济长期发展,应对人口结构引致的经济问题,政府除了适当放宽生育数量限制以外,还要有长期政策应对未来人口问题。这需要政府提高人们的教育程度和个体生产力,应对未来生育率的“自愿”下降。

不少文献基本上主张运用法律和道德的力量来平衡性别比。比如严格限制鉴定胎儿性别技术的应用范围,从而降低性别比^[20]。总体来讲,这是通过提高性别选择成本,引导性别比恢复正常状态。当然,随着生育数量的放宽,人们性别选择的原动力将

下降,性别比可能逐渐恢复正常状态。还有如王金营和赵贝宁主张通过其他公共政策(社区养老、公共福利养老、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与计划生育政策配合,应对目前社会老龄化和生育性别偏好问题^[1]。显然,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相关人口问题以及相应的经济问题。因而,调整其他公共政策,使其与计划生育政策相互配合,对于缓解人口结构的问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然而,以上建议难以应对生育率自愿下降和“男孩偏好”同时并存的情况,也难以处理这种情况导致的人口结构问题及其造成的经济影响。

(二) 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思考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相关建议,逐步允许和给予人们生育“二胎”的权利。但对仅生育一胎的家庭,政府需要通过教育、医疗等公共政策对独生子女家庭进行恰当的补偿。更重要的是,让需要生育更多子女的家庭,通过“生育权利”市场对独生子女家庭进行实质利益方面的长期补偿。这从国家层面上讲,一方面,国家控制了社会新增人口的总量。另一方面,国家可以降低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成本,减少社会矛盾。同时,这也更能尊重人的选择权利,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因而,我国需要发展和建立一个生育孩子数量权利流转的市场,对独生子女家庭和多子女家庭进行利益平衡。

从长期看,受社会经济的影响,生育率将呈下降趋势。在此背景下,低水平生育率与“男孩偏好”相结合,将导致性别比继续高位运行。由此导致的社会问题及其经济影响将更加严重。因此,如何处理“男孩”偏好的生育选择,是政府处理性别比上升问题的关键。

性别结构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男孩偏好”,但它为什么会长期存在呢?从经济学的直觉看,“生男”收益高于“生女”收益,是人们性别选择的关键。从历史和经济情况看,由于生产力的实际发展和女性教育的普及程度,女性潜在生产力长期处于未得到充分发挥的状态。因而,男性生产力收入回报长期高于女性生产力收入回报。较低的女性收入降低了家庭“生女”的收益。因此,国家和政府提高女性受教育程度和女性生产力回报,增加家庭“生女”收益,是促使性别结构回归常态的必经之路。

参考文献:

- [1] 王金营,赵贝宁.论计划生育政策的完善与调整[J].人口学刊,2012(4).

- [2] 陶涛 杨凡. 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效应[J]. 人口研究, 2011 (1).
- [3] 万宝惠 张晶 狄增 樊瑛. 用人口金字塔模型探讨计划生育政策走向[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1 (12).
- [4] 王金营.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效果评估[J]. 中国人口科学 2006 (5).
- [5] 胡鞍钢 刘生龙 马振国. 人口老龄化、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J]. 人口研究 2012 (3).
- [6] 汪伟. 计划生育政策的储蓄与增长效应: 理论与中国的经验分析[J]. 经济研究 2010 (10).
- [7] 车士义 郭琳. 结构转变、制度变迁下的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J]. 人口研究 2011 (3).
- [8] 李文星 徐长生 艾春荣.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和居民消费: 1989—2004[J]. 经济研究 2008 (7).
- [9] 周俊山 尹银.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J]. 金融研究 2011 (10).
- [10] WEI S J. ,ZHANG X B. The Competitive Saving Motive: Evidence from Rising Sex Ratios and Savings Rates in Chin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1 9(3).
- [11] 马骁骁. 从人口老龄化看中国未来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原因的实证分析[J]. 经济视角 2010 (5).
- [12] 范叙春 朱保华. 预期寿命增长、年龄结构改变与我国国民储蓄率[J]. 人口研究 2012 (4).
- [13] 李通屏 郭熙保. 扩大内需的人口经济学: 理论与实证[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1 (6).
- [14] 张乐 雷良海.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关系的区域研究[J]. 人口与经济 2011 (1).
- [15] 李春琦 张杰平. 中国人口结构变动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 2009 (4).
- [16] 王宇鹏. 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 2011 (1).
- [17] 魏下海 董志强、赵秋运.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劳动收入份额: 理论与经验研究[J]. 南开经济研究 2012 (2).
- [18] 汪伟. 人口结构变化与中国贸易顺差: 理论与实证研究[J]. 财经研究 2012 (8).
- [19] 李树茁 胡莹. 性别失衡的宏观经济后果[J]. 人口与经济 2012 (2).
- [20] 原新 石海. 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与计划生育政策[J]. 人口研究 2005 (5).

[责任编辑 卫玲]

Review and Reflection on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Family Planning Policy

JIANG Tao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The family planning policy has greatly reduced the fertility rate, promoted a rapid transformation of population in China, and produced a huge demographic dividend, which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The problem of population structure resulted from the low fertility rate, however, it is having a negative influence on China's economy. In this context, the paper makes a brief review of the specific content and the background of the policy, and analyses and summarizes the structure's impact on the economy. Finally, in order to make the policy produce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on the adjustment of the policy a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population structure; transferring of rights to childbearing; female productivity returns